

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Out of Place

A Memoir

本书获 2000 年纽约书奖和
安尼斯菲尔德 - 伍尔夫书奖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萨义德回忆录

格格不入

彭淮栋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本书获 2000 年纽约书奖和
安尼斯菲尔德-伍尔夫书奖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萨义德回忆录

格格不入

彭淮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美)萨义德(Said, E. W.)著;
彭淮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2
(2005.3重印)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2159-5

I. 格… II. ①萨…②彭… III. 萨义德, E. W. -
回忆录 IV. K83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7020 号

特约编辑 萧萍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 数 270 千字 图字 01-2001-0968

印 数 07,001-12,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献给康提·拉伊博士 (Dr. Kanti Rai) 和
马莉安·C. 萨义德 (Mariam C. Said)**

导读 流亡·回忆·再现

——萨义德书写萨义德

单德兴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回忆及其再现，这些与认同、国族主义、权力和权威等问题密切相关。

——萨义德，《创造、回忆与地方》

(Said, "Invention, Memory, and Place", 176)

萨义德是公认的战后影响力最大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在学术上是国际知名的重量级学者，为美国学界引入欧陆理论及另类观点，写作的题材包括文学、理论、政治、音乐、历史等，名著《东方主义：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1978，又译《东方学》）译成数十种语言，通行于世界各地，为后殖民论述（postcolonial discourse）的奠基之作。在政治上，他积极投入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运动，以

格格不入

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特立独行的勇气，言人之所不能言、不敢言。早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的敌对气氛下，他就公然呼吁以、巴双方承认彼此过去的苦难（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和巴勒斯坦人一九四八年的亡国失土之痛），进行和平谈判，以求和平共存，曾担任巴勒斯坦流亡国会独立议员长达十四年（一九七七至一九九一年），严词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二十多年来为巴勒斯坦人在西方世界的主要代言人。总之，萨义德除了在学术上的投入与杰出表现之外，积极参与政治、社会议题的公共空间，甚至一方面因为支持巴勒斯坦而被许多西方人士和犹太人视为暴力及恐怖主义的代言人，^①另一方面又因为主张和谈及声援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言论自由而名列“半打的中东死亡名单之上”（Pen 9），^②并勇于承担这些风险，在在证明了他不仅是坐而言的理论家，更是起而行的实践者，以具体的行为践行了自己有关知识分子的理念，充分表现出知识分子的风骨。

一般人印象中的萨义德，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是该校九位“杰出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之一），在专业领域内著作等身，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巴勒斯坦的处境，撰写政治评论与音乐专栏，俨然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通才（a Renaissance man）。有心人可以上溯他的学思历程：一九六四年哈佛大学博士，一九六〇年哈佛大学硕士，一九五七年普林斯顿大学学士，一九五〇年代

① 亚历山大（Edward Alexander）甚至把他扣上了“恐怖教授”（Professor of Terror）的帽子。

② 原因之一为：他是第一个以英文明确主张要与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平共存的巴勒斯坦人（“Expanding”，112）。

初赴美国就学。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东：在英国殖民统治及美国势力扩张时，就读埃及开罗的英国学校和美国学校，乃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生于耶路撒冷。然而，他早年的家庭生活及学校经历如何？这些在他内心产生何种感受？对他个性及观点的塑造具有什么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无法探知——一直到这本回忆录出版为止。

一九九七年八月我前往纽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到哥伦比亚大学，为即将付梓的第一本中文专著的翻译访问萨义德。几经波折，终能与他进行访谈。在一个小时左右的访谈中，萨义德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思绪清晰，反应灵敏，不似恶疾缠身经年的样子。在问到有关他的作品分期、归类以及各时期、类别的代表作时，他指出了四个时期：第一期的兴趣在“文学生产的存在问题”，接着分别是“理论期”、“政治期”，至于“最后一期，也就是我现在写作的时期，又更常回到美学”。他提到了晚近的三部作品：一本有关歌剧，一本有关艺术家的晚期风格，再就是“我正在写回忆录”（《知识分子论》）。

至于撰写回忆录的动机，他在回应另一个有关他个人的吊诡角色时（一方面自称是流亡者、“文化的局外人”，另一方面又是国际知名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有如下的说法：“我必须告诉你——我完全坦白——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大多数的时间我比较察觉到自己的不定、流亡、边缘化、局外人的处境。……我把自己的书全抛到脑后，好像是别人写的一般。我是很认真地说。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找出为什么对自己的作品有这种疏离感。”（《知识分子论》）

次年四月，我再度访问萨义德，不少问题围绕着他的回忆录。那时他已写了将近四百五十页，预计再写一章，于夏天完成，第二年问世（英文全书排印出来约三百页）。从言谈、神情看得出这部回忆录对他意义特殊，而且他对这部作品情有独钟。虽然以往萨义德也有些抒情与叙事之作——尤其见于他与瑞士籍摄影师摩尔（Jean Mohr）合作的《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众生相》（*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 1986）——但以这部回忆录最为突出。萨义德用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书写自己的童年及青少年世界，他成长的三个地方“现在都不复存在”（巴勒斯坦已变成以色列，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治下的殖民地埃及于一九五二年一去不返，黎巴嫩经过二十年的内战早已面目全非），全凭他惊人的记忆力（“对于早年的一些事，我的记忆清晰得惊人”，《印度之旅及其他》）和优美的文笔，栩栩如生地再现于读者眼前。

从萨义德本人当时的说法，我们可为这部回忆录及其写作归纳出几点特色。首先便是进度缓慢，原因在于：不像书信或报章杂志的文章直接在电脑上撰稿，“写回忆录时，我必须用手来写，而那很缓慢”，因此占用了他很多的时间与心思，甚至出外旅行时也随身带着手稿，得空便写。其次，全书的进展也很悠缓，为了尽可能完整，记忆力惊人的萨义德花了三百页的篇幅才写到一九四三年，也就是他八九岁时。若借用人类学家的说法，全书便是对他成长的世界的“厚重描写”（thick description），尤其是对世人颇为陌生的半个多世纪前的中东一个特定家族的精描细绘。就结构而言，虽然萨义德采用的是“叙事文体，然而却是很特别的叙事文”，有别于一般按照年代顺序撰写的回忆录、“传统的自

传”。萨义德“尝试创新”，“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结果就是他所说的纵横纠葛、“很阿拉伯式的结构”，以这种方式深入挖掘、探索自己的外在处境及内心世界。再就内容而言，书中对于人物及事件的描写，尤其是与父母的关系及互动，萨义德自认“坦然无讳”。最后就是自己和朋友对此书的看法。对萨义德本人，这本回忆录“意义非比寻常”自然不在话下。至于读过文稿的一些友人中，著名的文评家波瓦利耶（Richard Poirier）认为这是部“杰作”，其他一些人认为“也许是我最好的一本书”。然而，萨义德猜测自己的妹妹们对这本书“会不高兴，因为我们是个很奇怪的家庭”。

以上是这部回忆录出版前一两年，萨义德在接受笔者两次访问时的“夫子自道”。就是因为如此，更令人期盼该书早日问世，以便一窥究竟。虽然书中的不同章节曾在英、美等地发表或宣读，但全书正式出版却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于一九八九年签约，一九九四年五月动笔），并于二〇〇〇年获得纽约书奖（New York Book Award）的非小说类奖及克里夫兰基金会（the Cleveland Foundation）一年一度的安尼斯菲尔德-伍尔夫书奖（Anisfield-Wolf Book Award）。

前面提到，以往留意萨义德的人，即使有意追溯他的生平，也只能从访谈或著作中偶尔的透露，得到一些支离破碎的讯息。如在一九七六年的访谈中，萨义德曾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来说不是抽象，而是特殊的经验和生命的形式，具有几乎不堪忍受的具体感”（“Interview with Diacritics”，36）。此一特殊背景在形塑其观点上发挥了难以比拟的作用，他有关“流亡”的看法，甚至本书的书名“Out of Place”，都是明证。然而，究竟是

格格不入

如何“特殊的经验和生命的形式”？何种“几乎不堪忍受的具体感”？徒然留给读者去想像。但是，即使读者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又如何能臆测半个多世纪前，受到殖民统治教育、流离失所的一个中东少年的身心世界？一直到本书出版，透过其中生动的描述，读者才可能知道、感受，并看出萨义德年少时的遭遇、成长仪式 (rites of passage)、心路历程与后来身为知识分子的志业之间的可能关联。

全书对于许多人物与事情娓娓道来，例如：极端精明干练、深具商业才华（为中东最大的办公用品及文具商）、体育出众、管教严苛的父亲；时而亲昵、时而疏离，对子女“分（化）而治之”，带领他欣赏文学、音乐、戏剧的母亲；一九四八年所造成的流离失所以对巴勒斯坦人的重大创伤及历史意义；热心公益、席不暇暖地济助巴勒斯坦人的姑姑；在英国学校遭到布伦先生鞭打的羞辱（整整五十年后，萨义德才偶然在一本书中知道此人的全名，赫然发现他竟然还是位打油诗人！）；在开罗的美国学校中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般的境遇；当地俱乐部拒绝身为阿拉伯人的萨义德入内；就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持续两年多、相隔两地的初恋……总之，对于萨义德的成长及少年的心路历程感兴趣的读者，这是一部必读之作。至于后来享誉学术界，（违反父母的训诫）积极介入政治，献身于巴勒斯坦的自决运动，与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的关系（曾为心腹智囊，阿拉法特一九七四年联合国讲稿的主要撰稿人，却因认为一九九三年的“奥斯陆原则宣言”〔the Oslo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出卖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大加挞伐，以致二人交恶）……就看他是否继续撰写回忆录了。

以下试图运用萨义德本人在学术论述中所阐扬的若干观念(主要是“开始”〔beginnings〕、“再现”〔representations〕与“流亡”〔exile〕),来分析这部回忆录,提供读者参考。出版于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开始: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1975),是萨义德继有关康拉德(Joseph Conrad)研究的博士论文后的第二本专著。全书深刻省思“开始”的观念,并把它与“源始”(origin)对立:“开始”是“世俗的、人为的、不断重新检验的”,“源始”则是“神圣的、神话的、特权的”。他并说:“指定出‘开始’是为了指出、澄清或定义一个后来的时间、地方或行动。简言之,指定出‘开始’通常也包括了指定一个后来的意图。……我们看见‘开始’是一个完成或过程(在时间、空间或行动上)的第一点,而这个完成或过程具有延续及意义。因此,‘开始’是意图产生意义的第一步(The beginning, then, is the first step in the intentional production of meaning)”(页五)。

就此回忆录而言,萨义德有关“开始”的看法可做如下的引申。首先,迥异于以往的著作,本书献给两个人中,第一位便是他的主治医生拉伊(Kanti Rai,第二位是萨义德的太太,以往的著作也曾题献给她),书中的《致谢》及第九章也对恩同再造的主治医生致意。就是因为一九九一年在健康检查中发现自己罹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次年开始由拉伊医生主治,让他觉得仿佛头顶上悬着“德莫克拉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生命之弦随时会断,却又以坚强的意志步步求生(父亲以往对他的箴言是“绝不放弃”)。但也正因为如此清晰地面对人生可能的终点,加上代表与旧有世界联系的母亲于

格格不入

一九九〇年去世，更激发出他回顾自己人生/生命的意图，遂于一九九四年接受化疗的同一年，开始写回忆录，并自承以写作、重新创造以往的世界，来支持他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换言之，若非身罹恶疾，切身感受到生命危脆、时不我与，在学术及议题上屡屡创新，积极向前拓展的萨义德，不可能如此郑重其事地“回”过头来记“忆”“录”下自己的过往，并透过个人的记忆，具体而微地呈现出家族史，甚至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记忆与创伤。因此，就写作而言，相对于以往的学术著作与政治评论，此书是萨义德大规模以抒情、叙事的方式书写自己、家族、民族的开始。就他的人生而言，此书是一个离乡、亡国多年之人，面对死亡时开始认真回顾自己的人生，以今日之我探索、书写昔日之我，与内在自我 (inner self) 重建关系，与已逝的父母修好，并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为民族争回历史 (to reclaim history)。至于全书开始选择以“语言”、“创造”、自己的不英不阿、半英半阿的尴尬名字 Edward Said 等议题切入，不仅揭露了个人认同与家族认同的问题，也点出了书名的深意。

即使有再好的记忆力，但过去已然过去，回忆录透过文字记录过往的人、事、时、地、物，充其量不过是“再现”、“创造”、“开始”，而不是“源始”。这里触及另一个萨义德念兹在兹的主题：再现。综观他多年来的论述，若说“再现”为其主要观点实不为过。著名的中东三部曲《东方主义》、《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79)、《采访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1981) 的重要关怀，就是强势、主流的欧美世界如何来想像、观

看、区隔、围堵、宰制、再现他者 (the Other)。较特别的是《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众生相》，由他针对自己精挑细选的摩尔的一百二十帧照片，撰写长短不一、内容各异的文字，图文并茂地再现日常生活中的巴勒斯坦人，打破了巴勒斯坦人不是凄凄惶惶的难民，就是绑着头巾的蒙面恐怖分子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在自称《东方主义》续集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 中，再现依然为主要关怀，并且增添了地理 (geography) 及抗拒 (resistance) 等面向。至于一九九三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李思系列演讲 (BBC, The Reith Lectures)，次年出版为专书，广受瞩目，标题及书名便是“知识分子的再现”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中文版译为《知识分子论》)。因此，我们可以说，萨义德对于“再现”的关切可谓无时无处无之。至于这部回忆录，就相当程度而言是“三合一的再现方式”。此语可做二解。

首先，回忆录的性质与自传相近。“自传”在英文中是 auto-bio-graphy，就字源上可析解为 self-life-writing (自我—人生—书写)，一般而言“传主”、“叙事者”、“作者”为同一人，回忆录也是如此。以上是就自传的一般定义，把此回忆录视为“‘传主—叙事者—作者’三合一的再现方式”。在接受布伦姆 (Harvey Blume) 访问时，萨义德指出此书对自己的特殊意义：“回忆录是我对于尝试维持内在自我的完整 (the integrity of the inner self) 的回应，凭借的是摊开所有的矛盾与不合”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7)。然而，此回忆录中的再现，在萨义德本人的学思脉络下别有意涵。

其次，一般所谓的“再现”是对他者的再现，往往涉及政治

格格不入

(politics)、论述形成 (discursive formation)、权力关系 (power relations) 等。这是萨义德在《东方主义》等多本论述中所揭橥的，尤其强者（西方）、弱者（东方）之间的关系。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知识分子论》，进一步强调再现的伦理 (ethics) 层面。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本着自己的见解及良知，坚定立场，担任众人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群体 / 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权威与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向有权有势者说真话；而知识分子的一言一行，也在在代表 / 再现了自己的人格、关怀、学识与见地。换言之，在再现他者的同时，其实也再现了自己，因此该为自己的再现来负责。这是再现的第二层意义。此外，此书既然如上所述是“传主—叙事者—作者”三合一的著作，因而产生了第三层的意义：再现的对象就是自己。由此可能引发出其他的问题：当对象是自己时，再现的性质与作用如何？再现者的立场、诠释、权力、权威如何？如何判断其再现是否道地 (authentic)？如何厘清其中的伦理与政治？此书出版前后，萨义德遭到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 (right-wing Zionists) 的攻击，大抵属于这类问题。然而由于对方的立场偏颇，引据失当，反而模糊了上述问题的复杂微妙之处。^①

① 根据萨义德的说法，这是美国的保守犹太刊物《评论》(Commentary) 近二十年来第三次刊登攻击他的文章 (“Defamation”, 1)。第一次是一九八〇年有关其《巴勒斯坦问题》的评论 (作者为霍金 [Hillel Halkin])；第二次是一九八九年为他扣上“恐怖教授”的帽子；第三次则是一九九九年九月刊出韦纳的《“我的美丽旧宅”和萨义德其他的捏造》(Justus Reid Weiner, “‘My Beautiful Old House’ and Other Fabrications by Edward Said”), 宣称以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实地探察，访谈数十人，揭穿萨义德以往自述文字中的捏造。萨义德一一反驳文中的疑点，并指出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典型的“诋毁”(defamation)，以为只要证明这位举世公认的巴勒斯坦的代言人是骗子，就可以不但破坏他的公信力，也连带削弱任何巴勒斯坦人争取自身权利的主张。

简言之，由于回忆录中“传主—叙事者—作者”的三合一，以及其中涉及“对他者的再现”（如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同学、老师、学校……）、“再现他者时所再现出的自己”、“再现的对象就是自己”等三层意义，因此为萨义德一向关注的“再现”议题增添了新意。

最后就是“流亡”这个切肤之痛的议题。“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萨义德以此句开启他有关“知识分子的流亡”的议题（《知识分子论》）。此句来自他深刻的感受。其实，萨义德及家人即使在中东都觉得忐忑不安，仿佛一直在流亡：家人是置身于埃及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在主要是穆斯林教徒的中东，他们却是少数的基督徒；父亲在一次大战时曾服役于美军，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以致萨义德和妹妹们一出生便有美国身份，但母亲却因其巴勒斯坦—黎巴嫩人的身份，不能取得美国护照，甚至弥留之际还被美国移民局要求递解出境（狠心的移民局官员因而遭到法官痛斥）；富裕的生活使他们有别于一般贫困的中东人民，加强了萨义德后来为族人“代言”的补偿心理；殖民学校的教育使他对于宗主国既熟悉又陌生，对于族人既亲近又鄙视；身为家中惟一男孩的萨义德，一直觉得有负父母的殷殷期盼，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怯懦、彷徨、欠缺；能自由出入于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之间的萨义德，却因如此摆荡而找不到归属；至于一九四八年的流离失所，更是永恒的痛。

正因为亲身的体验，使他对于古今流亡之苦有着生动的描述：“在古代，流放是特别恐怖的惩罚”，原因在于这“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地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者，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

格格不入

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痛苦虽然依旧，但二十世纪的流亡却“转变成针对整个社群和民族的残酷惩罚，而这经常是由于战争、饥荒、疾病这些非个人的力量无意中造成的结果”。对于一九四八年之后便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和萨义德家族而言，流亡就是无法摆脱的命运。本书英文原名“Out of Place”，简短有力地指出了这种地理及心理上的失落与错置：在地理上，“永远离乡背井”，不管到天涯海角，都“一直与环境冲突”，成为“格格不入”、“非我族类”的外来者；在心理上，时时怀着亡国之痛、离乡之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萨义德的说法，正是出自这种深切的错置感与失落感，也难怪“拔根”（uprootedness）、“无根”（rootlessness）、“无家可归”（homelessness）、“失所”（dislocation）、“移置”（displacement）、“漂泊离散”（diaspora）、“流离失所”（dispossession）、“排除”（exclus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成为他各式写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然而，流亡与错置却未尝没有裨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疏离造成批判的距离，提供观看事物的另类观点：同时具备过去与现在、他方与此地的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萨义德在《寒冬心灵》（The Mind of Winter）一文中，对此有如下的说法：“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他本人更是因为幼时生活中的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英国、美国等因素，塑造出文化

混杂的现象 (cultural hybridization), 以多重视野观察、体验事物。

但是, 对另类的重视并不是为歧异而歧异, 而是为了强调更普世的人文与人道标准, 这使得他有别于后结构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者: “流亡者……有着双重视角。……就知识上而言, 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 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 从这种并置中, 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 譬如借着比较两个不同的情境, 去思考有关人权的议题”(《知识分子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支持南非的人权运动, 强调巴勒斯坦人应该尝试了解以色列人的过去苦难, 并呼吁世人以同样的人权标准来平等看待巴勒斯坦人的历史苦难与现实处境。由于他的多年努力, 世人逐渐能正视巴勒斯坦的问题, 他的主张甚至赢得许多以色列人的支持。

这个特色在他多年的写作中都可找到证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东三部曲中抱持鲜明的批判立场; 一九八六年《最后的天空之后》中多次提到“流亡”一词, 并指出一吊诡现象: “巴勒斯坦的认同在于流离失所和损失的经验”; 一九九三年《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强调地理、空间的因素及抗拒的可能性; 一九九四年的专书以“流离失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为标题, 诉说巴勒斯坦人争取自决的奋斗, 甚至二〇〇〇年初的《创造、回忆与地方》(Invention, Memory, and Place)一文, 一再强调三者与巴勒斯坦的重要关系——这些在在与这种位置/错置息息相关。他的学生更引述他的话说: “由于疾病和年事渐高之故,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白这个事实——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有真正在家/自在的感觉 (I really don't feel at home any